

关于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的若干思考

李文儒

内容提要 故宫博物院学术传统，学术资源，学术使命；“故宫学”学术思想，学科建设；科研体制机制的建立与创新；故宫研究的“当代性”；继续发挥学术刊物的重要作用；出成果，出人才，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关键词 故宫博物院 “故宫学” 科研管理 学术研究

科研工作博物馆中的位置，博物馆管理者如何认识、看待和处理科研工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家对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高度重视，我国公益性的博物馆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在深入认识博物馆核心价值及如何充分实现其文化价值的同时，科研工作博物馆中的位置、作用和实际操作正在发生变化。对于任何类别的博物馆来说，特别是对于故宫博物院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超大型博物馆来说，具有坚实的学术基础才能保障稳固、持久、全面的发展。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的层面看，只有具备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具有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才能在交流、传播中拥有较多的文化话语权和发挥较大的文化影响力。

传统 资源 使命

故宫博物院与生俱来的优良学术传统，要求故宫博物院高度重视和努力推进科研工作、学术研究。故宫博物院创办于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的李煜瀛明确提出：“多延揽学者专家，为学术公开张本”；“学术之发展，当与北平各文化机关协力进行”。当时已经成为全社会文化思想碰撞与新学科研究重镇的北京大学及所属学者，在故宫博物院业务建设上出力最大。被聘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的有蒋梦麟、陈垣、沈兼士、俞同奎，被聘为顾问及后来聘为特约专门委员的有马衡、袁同礼、徐鸿宝、李宗侗、徐炳昶、黄文弼、顾颉刚、吴瀛、朱文均、福开森、陈汉第、唐兰、余嘉锡、赵万里、马裕藻等人。参与初创工作后来成为重要职员的不少是北大教授或刚毕业的学生。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沈兼士任文献馆馆长，陈垣任图书馆馆长。后来与故宫关系密切、在故宫博物院成长起来的知名学者有罗福颐、沈士远、孙瀛洲、陈万里、冯先铭、单士元、刘九庵、朱家溍、于倬云、启功、王世襄、

徐邦达等。故宫博物院的建立集中和吸引了一流的专家和学者，成立之初的组织及活动充分体现出学术性、开放性、社会性的鲜明特点。初创阶段的工作较多用力于清点、整理藏品，并努力克服条件简陋的困难，及时向社会公布。“绝对公开，供学界研究，‘以学术为公器’”是故宫研究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在当时社会动荡的年代里，就陆续编辑出版了《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汇编了《筹办夷务始末》、《清代文字狱档》、《故宫所藏殿版书目》、《故宫方志目》、《天禄琳琅丛书》、《故宫书画集》等。影响最大的是1929年10月10日创办的《故宫周刊》，连续出版了510期。该刊图文并重，介绍馆藏各类文物及古建筑，文字部分有专著、考据、史料、笔记、校勘、目录等，很受学界的重视，亦广受社会各界的欢迎。清点文物及时向社会公布，多种档案文献尽量面向公众，迅速交流研究成果的优良传统学风在故宫博物院不断发扬光大。事实说明，故宫研究只要立足故宫，树立开放的理念与心态，吸引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加强与海内外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专家学者的合作交流，就能推进故宫研究的不断深入、创新与发展。

故宫博物院百科全书式的文物资源及对丰厚资源的充分利用，要求故宫博物院高度重视和努力推进科研工作、学术研究。故宫作为文化遗产，几乎囊括了文化遗产的所有类别，从不可移动文物到可移动文物，从物质文化遗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有近500年的宫廷历史。中国古代宫廷历史、宫廷文化艺术上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称帝，明清两代占了中国皇朝历史近四分之一时段；如果再上溯到3000多年前有纪年的商代，明清两代占了近六分之一时段，而作为最后的封建王朝，与以前王朝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从时间概念上提出问题，就会直接感受到明清两代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保存完好的紫禁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皇宫建筑群，更是一座最完整最典型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馆藏可移动文物不仅数量之巨无可比拟，更以其高、精、尖，以其几乎包罗万象的系统系列而无可比拟。故宫及其藏品，是物态的、活态的历史现场与物证，在许多方面是唯一的，无可替代的。研究故宫，无异于解剖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传统文化艺术，绕不开对故宫的研究。还有，作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之一，作为以文化遗产地为场所空间的博物馆，作为接待观众最多、出馆出境展览最多、影响最大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在中国博物馆的建设历史，博物馆的类型，博物馆文化价值及其实现等博物馆学学科研究领域，同样具有无可比拟的典型性、代表性。

故宫博物院应当承担的与故宫文化遗产相应的历史文化使命，要求故宫博物院高度重视和努力推进科研工作、学术研究。历史赋予故宫文化遗产多么重大多么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样赋予故宫博物院多么重要多么重大的历史使命。当代故宫人担当着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人类保护、管理、利用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的职责。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时代的发展，保护好、利用好、发挥好故宫文化遗产的历史作用，科研工作、学术研究越来越上升为必需的保障要素。故宫博物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科研工作经验，故宫人已经取得了一批又一批出色的科研成果，但远远不够。科研工作、学术研究的广度、深度、高度，及其在国内外影响力，与故宫文化遗产的地位与影响力还不相适应，与社会、公众、文化界、学界、同行的需求、

期望还不相适应，与国家文化建设、文化“走出去”的要求还不相适应。由故宫的历史地位决定的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地位，决定和要求故宫博物院的科研工作、学术研究格局应当自觉地建立在中国大历史、大文化、大学术的坐标体系之中，建立在全人类、全世界文化学术的大背景下。故宫博物院的科研工作、学术研究，应当通过管理者的努力，通过科研工作者的努力，尽快完成从个人自发到个人自觉，从集体自发到集体自觉的历史跨越。

“故宫学”：学术思想与学科建设

故宫学术行进到21世纪初，上任不久的郑欣森院长首倡“故宫学”，这是故宫人自觉地、努力地承担起意识到的历史责任、学术使命的鲜明的历史性标志，也是故宫人郑重的学术宣言与负责任的学术承诺。实现从个人的自发到自觉、集体的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跨越，是努力的方向，更是实际的行动。向这个目标进发，很有必要树立一个远大的学术理想，确立一个明确的学术概念，提出一个响亮的学术口号，高张一面鲜明的学术旗帜，建立一个科学的学术体系——应运而生的“故宫学”是对故宫学术要求的一个高度概括和集中回应，是从管理层面上升到集体自觉的重要行动。

故宫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性决定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的特殊性。“故宫学”作为统领性和凝结性的学术理想、学术思想和学术概念，具有方向导引、战略定位的意义，具有适时地也是及时地整合故宫学术资源，规划故宫学术前景，推进故宫学术研究，开创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学术研究新时期的重大意义。

“故宫学”是整体性的、整合性的学术。故宫研究资源包罗万象，研究内容丰富庞杂，但千头万绪，总与故宫有关。只有以宏大、开阔的“故宫学”学术视野、学术理念为指导，才能有效地整合研究对象、研究者——物的资源与人的资源及二者之间的配置关系，整体地、全方位地、有目标、有规划、有组织、有把握地推进故宫博物院的科研工作、学术研究。

“故宫学”是开放性的学术。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博大精深，决不是一个人、几个人、几十个人，不是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也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可以完成、可以穷尽的；博物馆的资源是公共性质的，是全社会全人类共有共享的，不是某个人、某部门、某单位的专属；关注故宫学术研究，在此领域及相关领域各具专长的研究者大有人在——“故宫学”立足故宫，以博大的胸怀，开放的姿态，吸引、争取、接纳来自任何方面的研究者。

“故宫学”是需要多元化、多样性研究方法的学术。故宫研究、故宫博物院研究内容兼跨中西、古今、文理。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需要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人文学科有人文学科形成的研究视野、理念与方法，理工科技有理工科技形成的研究视野、理念与方法，中国有中国形成的、西方有西方形成的学术研究视野、理念与方法，相互的交叉交流还会交互出新的研究方法。材料、工具、方法的革命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研究方法既要多样，更要创新。尤其要注重将高新科学技术及方法运用于文物的科学保护研究，文物的本体研究，文化遗产的传播研究，在跨学科研究和学科综合研究中实现

大的突破和提升。

纲举目张。庞大、丰富、厚重的“故宫学”需要、应当、也能够建立起具有内在严密逻辑关系而又呈现清晰的学科体系。要从学科建设层面研究学科的整体性、全面性与平衡性问题。要突出整体性中的重点，处理好重点与一般的结合，解决平衡性中的不平衡性，发挥优势，弥补不足与缺项。学科涵盖的范围和内容，大的方面可分为文化遗产学和博物馆学两大类。文化遗产是博物馆最重要的内容。文化遗产分为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遗产又包括遗址类(不可移动类)和藏品类(可移动类)。故宫博物院与一般的博物馆不同的是，本来区别明显的类别间的密切联系，形成复杂的综合的状态。一座皇宫，涉及政体、典制、礼仪、典籍、档案、建筑、珍藏等；一个“故宫学”学科，涉及历史学、政治学、建筑学、考古学、艺术学、文学、文字学、美学、科技学等等。以藏品研究为主是博物馆研究的一个共同特色，更是“故宫学”的一个鲜明特色。但以物为主也有一个发展层面的问题，比如某种器物的从个别到类别，从纵向发展到横向比较的研究，将器物学与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的研究。紫禁城建筑研究不仅是建筑科学技术、建筑工艺、建筑艺术等，更应该是对宫廷建筑历史、建筑思想的研究。博物馆研究方面，故宫博物院如何“完整地保护、管理、利用故宫文化艺术？如何实现博物馆文化价值？博物馆与社会公众关系如何协调？如何创新服务方式？展览的研究更是包罗广泛。好的展览建立在各个环节的研究基础上。策划、展品研究、设计、宣传推广、讲解，实物展览与虚拟展览，数字技术运用等。还有博物馆营销研究，博物馆文化与文化产业关系研究等等。许多领域不是没有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而是还没有组织、引导、上升到研究的程度，或是因为人力资源短缺而无法展开研究。

“故宫学”应当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相当的位置。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应当产生中国宫廷研究、古代建筑研究、各类藏品研究、博物馆研究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每一门类包含诸多分支，如中国宫廷研究(以明、清宫廷为核心)中可分出宫廷典制、皇宫建筑、宫殿装饰、宫廷家具、宫廷陶瓷、宫廷服饰、宫廷绘画书法、宫廷工艺、宫廷戏剧、宫廷宗教、中外宫廷比较等分支。

体制机制的建立与创新

全面推进、提升故宫博物院的科研工作、学术研究，在理论指导的同时，必须要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配套跟进。“故宫学”的提出并很快得到学界的认同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创新；“故宫学”提出之后科研处的建立，古书画研究中心、古陶瓷研究中心、古建筑研究中心、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等五个研究中心的相继成立，古陶瓷保护研究国家重点科研基地的成立，《故宫博物院科研规划》的制定，《故宫博物院科研课题管理办法》、《科研成果奖励办法》、《学术档案管理办法》、《学术著作出版项目管理办法》等八个关于科研管理的规章制度的制定颁布，科研项目管理的逐年完善等，则是科研体制机制的创新。

事实证明，故宫博物院建立科研管理的职能部门和不建立科研管理的职能部门大不一样。有了这样

的职能部门，科研工作、学术研究落到实处就有了体制机制上的保障。例如几年来，科研处坚持定期举办每月一次的学术沙龙和每季度一次的学术讲座，已经形成有影响受欢迎的学术品牌，不少业务部门也在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实际，择时举办部门专业学术讲座，学术沙龙，这类活动与院里其他学术活动一起，在全院范围内营造了较为浓厚活跃的学术氛围；又如科研处牵头，组织相关部门调研考察，结合故宫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科研规章制度，使院、部门、个人各类科研活动与项目有章可循；再如组织开展中断了18年之久的科研评奖，组织实施院重大科研项目等。没有专责的职能部门运作，类似的工作是很难开展、很难坚持的。一个新的学术理念树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规章制度制定了，一个切实的学术发展规划产生了，一个行之有效的科研项目课题制度完善了，一个及时发布和传播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搭建了，一个重视、支持、积极投入科研活动的氛围出现了，一个鼓励各方面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形成了，如此，才有可能、才有保障使故宫博物院的科研工作、学术研究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真正实现从自发到自觉，从个人发展到集体齐头并进的历史性跨越。

科研体制机制的创新同样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多方面的关系，不断地自我完善。比如要处理好虚与实的关系。虚指的是从思想观念、整体环境上营造浓厚的科研、学术的氛围，即营造方方面面面对科研工作、学术研究理解、重视、支持的氛围。实是指科研管理、学术研究要落到实处，要出成果、出人才、见效益，要确实起到增强核心竞争力，起到助推和提升全院工作的实际作用。科研规划制定以后更重要的是抓落实的环节，要研究把规划怎么落到实处的办法和措施。科研管理不只是科研处一个部门的职责，各个部门，尤其是主要的专业部门要将学术管理纳入部门管理工作之中，部门领导中有专人负责抓科研工作，责任明确，落实到人，那么情况肯定就大不一样。比如完善科研项目课题管理决不是一句空话，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要不断发现、研究和解决课题项目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处理好集体项目与个人项目、院级项目与部门项目的关系，把握好重点，提倡并组织好跨部门跨学科能对全局产生重要影响的重大项目，要向创新项目、突破性项目、补缺性项目倾斜。立项、组织、实施，成果精彩的项目应召开推广会、介绍会。对集体项目的参加人员的结构也应有所要求，发挥老中青结合的长处，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在课题项目的经费管理方面，要以完善的制度、操作性明确的条例保证经费的科学合理使用。课题项目从申报、评审、立项、执行、中期评估和结项一系列的环节，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流程，保证项目课题的质量和进度，并有效地防止学术不正之风。比如激励机制问题，奖励应采用多种办法，包括学术评奖、资助出版、学术考察、出国交流访问、学术假期等等。激励不应只有奖励，还要有压力，要解决评上职称就万事大吉的现象，对各类各级职称要有科研数量质量的指标指数要求，打破职称终身制的保障。科研信息交流也是一种激励，创办《科研工作简报》就是要让院内各部门和业务人员及时地相互了解各自的科研动态，不仅要了解做什么，更要了解怎么做，在简报中加大信息的传播量，及时报道各个项目的进度与阶段性成果，特别从方法论的角度作深度沟通交流，这样就能生发出相互激励推动的力量。

当代性

随着由博物馆公益性核心价值决定的社会性、公众性文化价值的彰显，由此决定在学术研究的路线和方向上，需要有一个重大的调整——实现由内向外的转型，即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等，从侧重博物馆内部研究、藏品研究，向侧重于博物馆整体研究、博物馆与外部关系研究并重的转型。即便是较为纯粹的内部研究，也要有一个鲜明的外部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博物馆服务的对象——社会、公众。研究目标一旦准确锁定，必定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博物馆学所有的指向、重心都应也都会因此而转移。

由内向外，由相对封闭到全面开放，由相对单一到综合丰富，由相对狭小到开阔博大，所有的聚焦点都集中在博物馆的当代性问题上。以博物馆管理学为例，由内向外的转型，重点由内部管理研究转向对外关系的研究，研究与政府、与社会、与公众的关系，研究国际交流、馆际交流，尤其要开拓研究公众、研究观众的新领域。内部管理研究重点相应变化，由传统的以“物”为主的藏品管理转向以“人”为主的服务管理，人力资源配置由与“物”关系密切的专业人员优先，转向与策划、公关、宣教人员并重甚至后者优先，并从机制机构上加强、保证与社会、公众关系密切的部门的职能和专业人员的配置。

再如对藏品、对展览的研究，是为自己，为同行，为专业人员，还是为公众？目标对象不一样，研究内容、重点、方法，包括表述、展示、传播、推广、服务的手段和方法都不一样。博物馆收藏文物，但博物馆不是文物；博物馆收藏历史，但博物馆更要参与历史的创造。一般来说，博物馆的藏品越古老越丰富，博物馆的地位就越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古老丰富的藏品中包含着同样古老丰富的种种信息。但是，如果古老丰富的信息不被发掘和认知，不被“当代化”，它们的重要价值就无法实现。所以，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是以今天的眼光阐发藏品的历史意义与当代意义。也就是说要通过深入地研究，在历史文物与今天人们的需求之间自觉地、努力地建立种种可以建立、可能建立起来的联系。让历史、让文物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创造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不管收藏什么，不管收藏品多么久远或多么切近，作为博物馆常态、动态的开放展示，总是面对当下当时的社会与公众，总是、永远是服务于当下当时，亦即永远服务于当代的，这更是博物馆的当代性之本。不论何时何地举办的任何展览，都是为了给当时当地走进博物馆的人看的。展览的内容固然需要研究，展览的内容给谁看，为谁服务，怎么样服务得更好，怎样让参观者满意，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获得应该获得的知识，更需要研究。过去我们比较注重内容的研究，集中于展品的研究，且较多地从专业的角度去研究，其实这只是展览研究的一部分，是博物馆专业人员习惯了的容易做到的一部分。展览研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研究、系统研究。不只是研究展品，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参观者，研究潜在的参观者，也就是研究服务对象，研究展品与参观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展品内容让当下的人们感兴趣、看得懂的组织、表达、传播、推广方式。

学术研究的院内外、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在当下的信息社会网络时代，是一个无可回避同时也是极具挑战的当代性命题。学术有专，但隔行不隔山，学术研究在理念、视野、思维、精神状态、方法等许多层面是相同相通的。只有融入世界学术发展的潮流之中，而不是疏远、游离世界学术潮流之外，才能在比

较参照中开阔视野，冷静头脑，吐故纳新，与潮流俱进，保持不断创新的活力和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攀登并达到世界一流的学术水准。近几年与世界著名的德国马普研究学会所属的马普科学史研究所的合作是一个值得认真总结的成功范例。当所有参与者进入一个全新的学术环境与学术语境中，与合作方零距离碰撞后产生的震撼，用参与者的话表述：专业外的刺激与收获远远超过专业研究的收获。还有同清史、明史、考古、建筑、科技等专业人员、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领域的合作，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合作，都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收获。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必须承认任何历史研究都具有鲜明的当代性。故宫自身由昔日的皇宫变成今日的博物院，就不只包容了重大的历史内容，更具有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意义。当代人对传统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应有当代人的鲜明的自主意识，应具有清醒自觉的反省意识与批判精神，应有科学的审美观。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从整体上说，皇权制度是被后来的社会制度否定的，那么如何对待漫长的帝制专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遗存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没有当代人应有的文化理性、文化精神，何况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帝制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和中枢部分。

我们所作的研究是处在中国重大历史转型期的学术回望。怎样做才是科学的承传是最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地方。这种思考应渗透在故宫学术研究的所有领域里。可以做这样的概括：15世纪到19世纪的紫禁城——20世纪的故宫博物院——21世纪的“故宫学”。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线性过程。阶段性的时间与空间的表述包含了所有的内容——用时代的眼光回望以往的时代。

继续发挥学术刊物的重要作用

《故宫博物院院刊》(以下简称“院刊”)1958年创刊，1958年、1960年分别出版一期后停刊，1979年复刊，至今已经走过了创刊半个世纪、复刊30周年的历程。创刊后那么长时间只出了两期，除了大环境的原因，也说明一个博物馆能够支撑起一个有分量的学术刊物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便如故宫这样的博物院也不容易，是需要相当的学术基础、学术耐力和学术坚持的决心与定力的。复刊后30年我们坚持下来了，而且是不断发展的，2004年作了较大幅度的改版扩版，说明我们还是有实力的。1980年创办的故宫特色的文化艺术杂志《紫禁城》，也坚持下来了，2004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2006年又改扩为月刊，说明我们的确是有实力的。《故宫学刊》(以下简称“学刊”)从2004年创刊至今已经编辑出版了五辑，尽管其定位、侧重点、特色、风格还在探索之中，但每一期还是很厚重、很实在的。《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简报》编发两年来，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学术刊物的基础性工作、常规性运作已经较为成熟，学术水平稳步提高，现在面临和重点思考解决的问题是在已经具备的较为扎实的基础上，如何明显地提升学术水准，如何更为鲜明地体现故宫学术特色。

学术史上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学派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故宫学”，故宫学派也需要经历一个从朦胧到清晰、由起步到成熟、由自发到自觉的阶段。“报刊”本身就是近代社会变革的产物，更是促

使社会变革进步的力量。例如《新青年》与五四运动，甚至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关系。文学流派、文化流派、学术流派、学科建设与刊物的关系相当密切。故宫博物院建院之初的《故宫周刊》、《故宫旬刊》、《故宫》(月刊)、《史料旬刊》、《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等若干种刊物，对于向社会宣传故宫博物院，对于故宫博物院的建院管理，对于故宫文物的研究，对于博物馆的研究，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故宫学”形成学科体系，是需要一定的基础、一定的积累的。建立一门学科并不容易。在一个学术概念提出，一个学派的产生和一个学科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学术刊物理应做出重要的贡献。“故宫学”正处于开创初创阶段，正在逐渐明确框架内容、构建学科体系，亟需概论性的、专论性的学术著作的强力支撑，更需有分量的也是大量的学术论文的有力支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术刊物担当的任务是很明确的，责任是重大的。今后如何发展，把几个刊物办成什么样子，关系到“故宫学”学术体系的建立，故宫博物院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创新，学术水平的提升，专业学术人才成长的大局。刊物的学术层次、学术水准和学术建树，对于“故宫学”学术体系的构建，学科的建设都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在办刊的指导思想上，要胸怀大的学术理念，秉持宽阔的学术视野，把握更高的学术追求与目标。学术刊物需要依托研究资源，而资源的特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刊物的特征。这里面就体现着、检验着编辑的水平，表现出来的就是刊物的特色与风格。要根据两个资源的特性，即物的资源——文物资源的特性和人的资源——研究人员资源的特性、变化及研究的方向，思索和确定应对的方案，使学术刊物在体现和强化学术研究的鲜明特色与前瞻性方面起到导引性作用。

《院刊》与《学刊》的关系要明晰，特色要分明。《院刊》、《紫禁城》创刊至今，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定的特色，在社会上、学界、文化界、艺术界、收藏界、行业界形成了一定的学术、文化艺术品牌影响，应继续发扬文物研究方面的传统长项，坚持与强化自己的特色，继续着重于文物学、器物学、博物馆学的研究。继续牢牢地立足于故宫博物院这一综合性的古代皇家历史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定位上，从藏品研究出发，以历史纵横学科交叉的广阔的文化学术视野提升对藏品的既有研究水平，提高文物鉴定的科学性，文物鉴赏的艺术性，致力于促进以新的学术眼光与新的学术方法产生新的研究成果。例如，结合我院具体的文物研究实际看，之前对书画、瓷器、玉器等大项关注较多，而对院藏的很重要的青铜器、甲骨文等尚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对宫廷典制文物、生活用品文物、宫廷原状陈设、工艺杂项研究也少，这与专业人才不足有关，也与研究方向的导向有关。在类似的问题上，刊物有时应起到导向、补缺、平衡以至培养学者的作用。编辑人员有眼光、有水准的某一次稿件组织或许就为某位专业人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确定了研究方向。长久坚持下去，由此就有可能催生一批各有所长的学者型的专家。此外，在博物馆学研究层面，也存在很大的缺位，缺乏足够的关注，缺乏有分量的文章。作为全国最大、藏品最多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既有综合性、又有代表性，几乎涉及到博物馆各个层面。大遗址，中国古代建筑，原状陈设，专题陈列，国内外流动展览，古建维修，文物保管，科技保护，古建环境里的文物展陈，学术研究与交流，展览策划与推广，信息数字建设，多媒体传播——一座超大型博物馆的管理涉及到博物馆管理学的方方面面，都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给予学术上的总结与提升。

《学刊》自2004年创刊以来，定位正在逐渐清晰，但急需进一步明确。《学刊》要区别于论文集，更非学术专著，还是要抓住并体现出“刊物”的特色，要建立起几大重要版块。在论文内容范围方面，要与《院刊》划定一个大体的界限，器物研究、文物学研究、博物馆学研究以《院刊》为主，《学刊》则侧重明清宫廷史的研究，侧重发掘公布新的史料的发现与整理，侧重古建大修、整体保护的研究和宫廷建筑史、营造技术的研究，侧重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研究，侧重文物科技保护研究，等等。另外，回到“故宫学”的学科源头去寻找题目。郑欣森院长曾经写过研究郑振铎、沈从文、马衡等故宫学人的文章，《学刊》要继续做梳理学术史的工作，包括故宫与北大的学术渊源，故宫几代学人的传承，组织撰写带有研究性的学术史料以及学术评价文章，等等。

出成果 出人才

科研工作、学术研究最权威、最终的解释权属于成果与人才。故宫博物院85年以来的荣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自灿若群星的在行内外、国内外声名显赫的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学者。而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影响力，统统来自他们的学术成果。这些年来，故宫博物院自觉地尊重、继承、弘扬光荣学术传统的信念与表达之一，就是陆续地尽可能完整地整理出版老一辈学者们的学术成果。已经出版和正在整理出版的有马衡、唐兰、罗福颐、单士元、孙瀛洲、陈万里、冯先铭、徐邦达等先生的文集。集中体现故宫博物院专家学者各自代表性论著的“故宫学术文库”，已有15位学者的15种专集面世。另有以推出中青年学术成果为主的“紫禁书系”，已编辑出版5辑27本。三个系列，基本上可以反映故宫博物院几代学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学术风貌。

从本世纪初开始持续进行20年的故宫大修和已经完成的长达7年的故宫博物院文物清理的浩大工程，对于研究工作、研究人员来说，既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更是难得的将研究深入进行下去的机遇。因了大修，有了《明清宫廷建筑史料长编》和《故宫大修报告系列》研究项目的开展；因了文物清点，有了数百卷的《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和《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的进行；因了大修与清点，有了《故宫百科全书》的编纂。除了此类院重大研究项目外，关于部门及个人的研究，有大的学术眼光与大的学术襟怀者已经在大修和清点工作中完成了研究方向、研究课题的调整与定位。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随着清点工作的基本结束，大多专业人员也从清点整理工作中“解放”出来了，有了更好的条件从事研究工作了。蓄势待发，假以时日，“故宫学”研究成果的周期性涌现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故宫人是幸运的，故宫博物院的专业研究人员更是幸运的。故宫博物院的文化遗产资源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样的明显优势，是其它博物馆及文化遗产地无法比拟的。但是，如何将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为学术资源优势，转化为学术研究优势，转化为研究成果优势，转化为专业研究人才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优势，转化为持续发展、科学发展优势，这就是我们已经在努力和需要更加努力地追求的目标，这就是我们已经承担着的和需要更加自觉地承担起的历史使命。随着“故宫学”学术思想的确

立，学术氛围的形成，研究机制的建立，研究方法的演进，研究的深入，科研管理与学术研究自身经验的积累，以及与大学、研究机构联合培养在职专业人员，再加这些年来高学历高学术素质的专业人员的不断充实，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梯队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一批中青年学者正在迅速成熟成长起来。完全有理由期待，在今后的三五年以至十年内，涌现出三五十位国内外知名的中青年“故宫学”一流学者；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迎来百家争鸣、百花盛开的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学术研究的春天。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张 露)

Reflections on Scientific Researches of The Palace Museum

Li Wenru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cademic traditions, resources and missions of the Palace Museum is the fundamental basis on which Gugongology (Gugongxue) is established.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thought and disciplines,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make the study of the imperial palace contemporary. Furthermore, the Palace academic journals keep playing an active role in publicizing and advocating. Honestly, Gugongology (Gugongxue) has no alternative but to develop sustainably and scientifically, which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richer fruits and talents.

KEY WORDS: the Palace Museum, Gugongology (Gugongxue);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academic research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21 to 030.*

Constitution of Scientific Academic Incentive Programs: A Survey of 1991-2008 Research Achievements Awards Assessment of The Palace Museum

Yu Hui Zhou Gaoliang

ABSTRACT: It i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summary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for 1991-2008 for the Palace Museum to hold the awarding campaign through extensive consultation and evaluation. The prize-winning works, in a sense, represent the studying, exhibiting and publishing levels of the palace museum in recent years. The highest-awarded productions will prominently act as advanced models in the progressive study of Gugongology (Gugongxue) and promote the academic level of the palace museum. Also, constant improv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introduction of talents training system and a variety of academic exchang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alace museum to gather experience in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Therefore, awarding assessment of the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is among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build favorable talents growing environment, set up talent incentive programs and promote scientific researches as well.

KEY WORDS: the Palace Museum,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awards assessment; academic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31 to 040.*